

緒論



本研究考察了以下問題：在中國工業化的早期、在農村尚有大量剩餘勞動力大軍的時期，中國有無可能在未來幾十年裡建立一個文明的、社會凝聚力強的社會？

為了滿足積聚階段的要求，中國是否注定要經歷長時期嚴酷的政治統治？如果中國沒能實現社會凝聚的發展道路，其社會和政治結構是否會保持穩定？中國正在21世紀初進行工業化的事實會使這一任務更難還是更易？中國面臨大量其它深層次的發展挑戰，包括大面積的自然環境的惡化，這會使該任務更難麼？中國面臨大量國際關係的挑戰，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這是否會使該任務變得更難以實現？中國大型企業的生存受到來自高收入國家的全球大型企業的威脅，這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對中國這樣一個擁有悠久的經濟發展史、深遠的文化的大國而言，該任務是更難還是更易？

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一直享受著有史以來經濟增長最顯著的時期之一。但是，隨著這個國家進入其發展的下一個時期，它將面臨著深層次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大範圍的貧困和迅速增長的不平等、中國商業面臨全球商業革命的挑戰、嚴重惡化的自然環境、國家能力的日漸衰落、國際關係的全面挑戰、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普遍腐敗、以及全面進入全球金融系統的極度危險——這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已經昭然若揭。中國領導層正在同時竭力應對全球化、轉型和發展帶來的挑戰。任何其它國家都不曾面對這一系列挑戰。在這條道路上，沒有一本現成的教材可供中國參考。中國領導層的责任重大，因為失敗的代價是非常巨大的。社會和政治解體的可能性切實存在。政策的

每一項舉措都必須避免產生這種潛在的災難性的後果。

每一個問題在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學者和社會當中都有激烈討論。一個廣泛的共識是，中國在脫離計劃經濟的道路上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當中是沒法停留的。他要麼向左轉、要麼向右轉，要麼甚至轉身往回走。還剩下一個選擇就是，沿著他原來選擇的那條道一直往前走。

有些人認為中國別無選擇，祇有接受以下事實：發展階段的特點就是混亂的政治經濟秩序。他們將之與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所說的「原始的資本積累」時期相提並論。很少有人懷疑，中國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社會穩定。許多人認為，在這種動蕩的、嚴酷的環境下，實現以上目標的唯一道路就是實行嚴厲的社會控制：積累過程必須先行，否則就沒有「發展」。這種觀點從別處工業化早期的史例中得到了典型佐證。

國內外很多人贊成「體制」轉變。他們認為擺在前面的艱巨任務祇有用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決。這一陣營中的許多人認為，中國效仿的模式應該是美國，而不是「破產的」歐洲福利國家或者日本的「准社會主義」模式。幾乎無一例外的是，鼓吹這種觀點的人都奉亞當·斯密為權威，他們說，亞當·斯密論證了唯一理性的組織經濟的道路是經歷自由市場。常常有人斷言，中國漫長的經濟史為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強有力的客觀教訓：中國在中世紀取得的技術成就因專制國家而沒能進一步發展，而這一專制國家恰恰阻止了中國走上歐洲所奉行的資本主義道路。推廣言之，他們認為國家的作用越小，中國在今後的進展就越快。

第三派就是「新左翼」，他們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越來越融合和依賴全球經濟是完全錯誤的。他們認為，中國祇有通過減少本國對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的依賴、返回到毛時代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政策，才能解決越來越嚴重的矛盾。

另一種觀點就是，中國必須沿著她過去20年所走的路繼續走下去，但是，要使這條道路能夠適應中國所面臨的全新挑戰。在過去20年裡，

中國領導層脫離毛時代的計劃經濟，摸索前行。¹與前蘇聯的改革道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一直奉行「摸著石頭過河」。²中國的道路深受這個國家自19世紀中期以來所經受的災難的影響，不僅僅是「大躍進」之後的大規模饑荒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巨大痛苦。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決心避免類似這種政策所導致的災難。改革的歷程一直被當作是一個全面的「體制轉型」的複雜過程來對待，這其中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和心理的因素都被看作是一個完整的整體。與前蘇聯不同，中國決定在考慮政治改革之前，先攻堅經濟改革，然而，這並不與為了提高官僚機構的能力所作的巨大努力互不一致。

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原則是人們在允許大規模施行某項政策之前要進行試驗。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早期，「承包到戶責任制」的改革開始在鄉村實行。20世紀80年代這種機制向城市推進，廣泛推行了企業「承包責任制」。到了20世紀90年代，取而代之以更大範圍的企業自主權，以交稅代替向國家提交贏利、將公司資產推向國內和國際股票市場。對外來投資的控制逐漸放鬆，接著在20世紀90年代迎來一股外來直接投資的熱潮。截止2002年，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外來直接投資接受國。擁有累計外來直接投資約4000億美元。「鄉鎮企業」在資源配置方面獲得更大的自由度，並且成為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早期經濟發展中非常活躍的一部分。

包括市場決定價格在內的市場要素和企業家逐漸擴散到整個經濟之中。儘管私營商業行為尚未給予正式保護，但是逐漸獲得承認，並且擴散到經濟體中的各個角落。在2002年7月，國家宣佈私營業主可以正式合法地加入共產黨。2003年「十六大」召開之際，黨總書記江澤民宣佈應該根據對社會的貢獻來對公民作出判斷，而不應因他們擁有財產而受到處罰：「江的發言為更快地發展保護私有財產和新興的中產階級企業家創造財富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支持」。³在這20年裡，對外貿的控制逐漸放鬆，中國於2001年底終於加入WTO對此做了最後的推進。外匯控制也逐漸放鬆，到2003年，人民幣在資本賬上仍然不能自由兌換。

中國的漸進體制改革取得了傑出成果。到了 2002 年 11 月「十六大」之際，中國已明確地離開了河的「此岸」，即舊毛體制，然而「彼岸」尚祇能依稀可辨。2002 年末的「十六大」任命了新一代領導人，包括新的黨總書記胡錦濤。2003 年初，在他當選後的第一次講話中，他把中國目前的情形比作內戰後期毛主席領導集團所面臨的局勢。

1949 年 3 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大會上，毛澤東做了非常重要的講話，該講話概括了面臨的任務。對國民黨的勝利基本結束。中國共產黨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毛主席警告該黨應警惕自滿，要意識到前方還要進行漫長而艱難的奮鬥：「奪取全國勝利，這祇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⁴該講話的中心思想是，面臨來自國內外的巨大挑戰，該黨需要找到一條道路，以完成應對挑戰的艱巨任務。同樣，中國目前就處在十字路口。面臨如此巨大的挑戰，她必須摸索前行，時刻意識到體制崩潰的可能性將令以前的成就毀於一旦。

為了尋找前進的道路，中國領導人正在審視中國的過去，並吸取他國的教訓，以找到一條能建設穩定、團結和繁榮的社會的道路。這種努力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外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義。

註釋：

1 Naughton B. :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 Wang Xiaoqiang : *China's price and ownership reform* (王小強 : 《摸著石頭過河 : 中國改革之路》) 。

2 Peter Nolan : *China's Rise , Russia's Fall* 。

3 《金融時報》2002 年 11 月 10 日。

4 毛澤東 :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 第 1438 頁。